

江西苏区的“红色戏剧”

徐佳佳

“红色戏剧”创作的重要人物原型。1929年冬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贵溪县演出的话剧《年关斗争》描绘了苏区农民武装暴动的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贵溪北乡苏区一区陵岗杨村劣绅杨克明、一区古港村地主恶霸俞麻子等反面人物，贫农团长农民张三、工厘会主席农民李四等“年关斗争”的主角。戏剧中张三在杨克明、俞麻子等人压迫下，从一个习惯于认命不懂反抗的传统农民，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帮助后，奋起反抗地主压迫，转变为一位革命者。张三的性格和遭遇是旧中国亿万农民的缩影，具有典型性，戏剧中他跌宕起伏的命运和细微的思想转变历程，体现了“红色戏剧”在塑造人物时注重避免人物性格扁平化、力求塑造丰满人物形象的手法，是“红色戏剧”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

1932年在江西赣县田村苏区上演的戏剧《活捉张辉瓒》，讲述的是1930年12月江西吉安龙冈当地红军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故事。戏剧的主要人物妇女主任、洗衣妇、农民甲乙丙等的原型均来自江西当地的工农群众。

从“五四白话”到大众语言：江西方言促进“红色戏剧”通俗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人掀起白话文运动，主张用“五四白话”取代文言文，促进中国人语言表达方式的口语化和大众化，但由于当时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白话文并没有得到大范围推广。

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走向通俗化、大众化？苏区“红色戏剧”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探索，并给出了答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苏区戏剧工作者在戏剧创作中大量采用苏区各地的方言、土语、俗语等群众日常使用的鲜活语言，摒弃大量信屈聱牙的文言文和书面语，使得苏区“红色戏剧”让群众一听就懂，愿意听、喜欢听，让“红色戏剧”真正走向大众。

由于苏区“红色戏剧”的受众中有大量工农群众、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同时许多“红色戏剧”故事也发生在苏区，为了让这些人群更好地欣赏“红色戏剧”，也为了保证故事的真实性，在“红色戏剧”的创作过程中，江西方言俗语等被广泛运用于“红色戏剧”脚本当中。如1934年戈丽编写的红色歌剧《志愿当红军》讲述了江西苏区农村中一对农民夫妇在敌人对苏区发动第五次进攻前夕，丈

夫准备参加红军的故事。为了让当地观众感到更亲切，该剧台词中用了大量江西方言，如“你为什么田中做事做到这么晏才回来”，其中“晏”就是赣南方言中“晚、迟”的意思，“要去就要去，你回把婚离，我倒政府去呀，马上报告你”，其中“回”就是赣南方言“只管”的意思。

而1934年3月26日由江西省苏俱乐部创作的红色话剧《春耕占线》在赣南上演，戏剧展现了江西苏区群众开展春耕的场景。为了真实反映这一生产情况，该剧采用了大量江西赣南客家方言，如“我来话呀！解我的旧年一担田是收到一担半谷的，你们大家的田少收谷是田春耕得不好，又不努力，我来告诉你吓！”其中“解”为客家话，是“我”的意思，“吓”则是江西方言中的语气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啊”“呀”。为展现戏剧的真实性，达到较好的演出效果，编者还要求“此剧演时最好用当地话语”，便于当地群众接受。

江西苏区群众丰富的语言，不仅为苏区“红色戏剧”的创作贡献了本土语言元素，让“红色戏剧”更加生动鲜活，也让戏剧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更容易打成一片、产生共鸣，是红色戏剧成功的重要因素。

从“苏联”戏剧到民族文艺：江西民间戏曲文化丰富“红色戏剧”创作形态

早期的苏区“红色戏剧”较多受到苏俄文艺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苏化”特征。一方面苏区“红色戏剧”的主要开拓者，如李伯钊、沙可夫等都有留学经历，在戏剧创作时借鉴了较多苏联戏剧理论和表演经验，如苏区“红色戏剧”中的各类活报剧就是大量借鉴了苏联活报剧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苏区工农剧社、蓝衫团等戏剧组织也是仿照苏联戏剧经验建立的。

实践证明，在借鉴国外优秀戏剧文化的同时，充分利用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形式，创作出符合本民族实际需要的戏剧文化，展现出具有本土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戏剧作品，才能让戏剧艺术更有生命力，这是苏区“红色戏剧”的创作方向。

江西民间戏曲文化则为苏区“红色戏剧”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如“红色戏剧”中广受欢迎的小型歌剧就是从江西的采茶戏、东河戏等戏曲发展而来。1930年在江西赣县田村苏区上演的红色戏剧《打宁都》采用了东河戏的唱腔，描绘了红军攻打宁都、石城等地的过程，乡土气息浓郁、立足农村的表演形式让该剧深受苏区群众喜爱。

同时，江西客家山歌也是促进苏区“红色戏剧”民族化实践的重要本土元素。苏区戏剧运动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在给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学员上课时，就发现兴国客家山歌手经常唱以“哎哟哟”起调的兴国山歌。他认为将这种民间歌曲运用于戏剧创作中，会使“红色戏剧”的创作更有民族特色，并展现出更大的艺术魅力。在他的引导下，更多的江西民间文化进入“红色戏剧”，促进了“红色戏剧”的民族化。

与民间戏曲文化等相结合，让苏区“红色戏剧”拥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在探索世界化与民族化的道路中的有益尝试。

从苏区戏剧到当代文艺：红色文化一脉相承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苏区红色戏剧家们先后创作了近300种戏剧作品，成为中国共产党初次局部执政中在文艺工作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

从戏剧表演方面看，将能否根据观众需要调整唱腔、台词、形体等作为演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一标准将群众需要作为评价核心，增强了苏区文艺与群众的互动，引导苏区时期及之后的延安文艺、解放区乃至当代文艺朝着大众化方向发展。

从戏剧理论方面看，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服务的理论与延安文艺、解放区乃至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理论内涵相通，至今仍指导着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

从戏剧题材方面看，以苏区故事、人物为蓝本，以展现工人、农民等群体在生活、工作、战斗及思想情感状态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戏剧”不仅扩充了我国戏剧的创作空间，还丰富了我国的艺术门类。

从戏剧人才方面看，“红色戏剧”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量戏剧创作、表演人才，这些人为之后的延安文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苏区戏剧运动的领导人李伯钊，她以江西苏区斗争故事为蓝本、江西群众为原型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戏剧”，如歌剧《自愿当红军》、话剧《战斗的夏天》、活报剧《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为苏区文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戏剧运动成为革命运动的助推器，“红色戏剧”成为最受苏区群众欢迎、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戏剧描绘的主要内容、还是塑造的人物形象，乃至戏剧语言、创作形态等方面，苏区的“红色戏剧”都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崭新文艺气象。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了。分别时，我们祝袁老健康长寿。

那年袁老已是80岁高龄，祝他健康长寿，既是分别时的客气话，也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心意祝福。

由于见过面、合过影，此后的日子里，我自然而然地留意着袁老的消息，知他始终活跃在科研一线，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袁老的形象，感觉他尽管年岁一年高过一年，但一直都很健康。在他成为“90后”之后，我想他定能成为“00后”的百岁寿星。

有些人，他们的人生精彩绽放，达到了世人景仰的精神高度，伟大到我们以为他没有生老病死。在我心里，袁隆平就是这样的。因此，袁隆平逝世的消息传来，于我来说，感到很突然，甚至是很震惊。因为之前从未曾听说过袁老患病的报道，今年年初，他还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科研一线开展工作的呀！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后来才知道，今年3月10日，袁老在三亚杂交稻研究基地摔了一跤，引发身体不适。后来，转到长沙住院治疗。5月22日中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逝世。

我知道再精彩的大戏都有谢幕的时候，但袁隆平的突然离去，还是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啊！

“我要为让中国人吃饱饭而奋斗！”为了这个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最朴素的愿望，袁隆平一辈子痴心不改，始终做一位“稻田守望者”。手植一穗稻，自此无饥饿。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袁隆平使我们吃饱了肚子，他是我们的亲人。

江山思国士，人去稻田丰。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而他本人就是一粒卓越的种子。他将粮食的种子、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浩渺星空，那颗被命名为“袁隆平”的星，永远是夜空里最亮的星。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
【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智库）特邀研究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员】

文史
WENRENYISHI

梁启超妙作咸鱼对

李云贵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从小就非常聪明机智，才思敏捷。5岁时就开始读《四书》《五经》，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人们称为“神童”。

祖父梁维清十分喜欢梁启超，梁启超9岁那年，梁维清带着他乘坐一艘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是梁启超第一次乘船离开家乡。当时满船的人都是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

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用咸鱼入诗入对，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题目。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一道

文史
WENRENYISHI

胡适扶掖后进

沈治鹏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这位文学巨匠对进步、勤奋的后生多有扶掖。

1934年，主编《独立评论》的胡适收到一篇学生来稿——《试谈专制问题》。这篇文章以胡适与蒋廷黻两人的争论展开，分别批评了蒋廷黻与胡适的观点。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胡适非常欣赏，觉得作者申寿生有文字天才，很快就刊登在《独立评论》上。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申寿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13篇时论。

申寿生在撰写评论文章的同时，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常写小说投稿。《独立评论》是一份专门发表时事评论的理论刊物，从不登文学作品，但主编胡适却给申寿生大开绿灯。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仅欣赏申寿生的理论文章，而且喜欢他的写实小说。申寿生的小说创作主要是短

文史
WENRENYISHI

赵元任“惧内”

周惠斌

1921年6月1日，“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与中国第一个留日医学女博士杨步伟喜结连理，两人的结合，后来被称为“一对为时所羡慕的佳偶”，是现代最美满的婚姻之一。

然而，赵元任“惧内”，在民国初期的学界颇为知名。

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府上大小事项谁说了算？”杨步伟“顾大局识大体”，谦逊地回答：“我在小家庭里有点权，可是大事情还得夫君决定。”赵元任却插话道：“不过，家中大事情很少……”心无芥蒂地供认了自己“惧内”的底牌。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继前任罗家伦之后，遭到学生代表大会驱逐罢免。学校教授会致电教育部，要求“另简贤能”。有人提议请赵元任执掌清华大学，吴稚晖诙谐地说：“那不如圈定杨步伟女士做校长好了，反正两个礼拜以后，便轮到赵太太掌管的。”一言既出，赵元任“惧内”的名声更被坐实了。

1961年6月，赵元任70岁寿

文史
WENRENYISHI

徐悲鸿打赌

黄山

徐悲鸿在海外留学时，常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从他与人打赌的故事就可见一斑。

那是徐悲鸿在法国留学的时候，遭遇了外国同学的歧视。一天，一个外国同学又嘲笑中国和中国人说：“中国贫穷落后，是东亚病夫。中国人学画，不论多么勤奋，都不可能有所造诣。不过都是些业余爱好和业余水平罢了。”

徐悲鸿听了这些话，忍无可忍，就提出与那位外国同学打赌。他说：“既然你诋毁中国和中国人有能力，那你就从今天起，我们打个赌，比一比，看谁毕业的时候在绘画上学有所成，更有成就？谁输了，谁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认赌服

输。如何？”那位外国同学自负满满地说：“好，我接受弱者的挑战，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不过，你这真是不自量力。你如果输了你就得认输，别到时候不服，我们谁输了都不准抵赖。”

从此，勤于钻研绘画的徐悲鸿更加发愤图强了。他用眼睛、用手在学画，更是用全身心去刻苦学习绘画。结果，到了毕业的时候，徐悲鸿在绘画方面的成就和个人艺术修养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敬重。那位曾经小看中国人的外国同学对中国人的看法彻底地改变了，他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那份可笑自负。他正式向徐悲鸿道了歉，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认赌服输，心悦诚服地表示要向徐悲鸿学习。

与袁隆平的一次合影

贺震

光影
史话
GUANGYINGSHIHUA

5月22日，辛丑年四月十一，中午，91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带着“不下乘凉梦”，永远地睡去。

此时，正值小满时节。在北方，夏收作物将满未满，籽粒渐盈；在南方，夏收复种，一派繁忙。

回到家打开电脑，凝视着十几年前与袁隆平的合影，不由得哀思如潮，泪流满面。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与袁隆平拍了一张合影。印象中，这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与名人合影。

十多年前，我在江苏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工作，分管环境政策。那年夏天，我与负责全省排污收费的同事及省物价局的同仁，去广东省调研环境价格政策，住在省政府附近的广东大厦宾馆。那日午后，我与同事在宾馆大厅等候广东省环保厅和物价局的同行，一抬眼，一个老农民模样的身影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黝黑瘦削、颧骨高突，脸上布满皱纹。定睛一看，那不是袁隆平吗！

因从小在农村长大，饥饿给我少年时代留下了太过深刻的记忆，故此对袁隆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与感恩。我与同事不揣冒昧地迎上前去。

“您好！袁老！”

“你们好！”

袁老见我们走来，双眼放出慈祥而温暖的光芒。一边热情地回望着，



一边与我们一一握手。老人的手瘦瘦的，但很有力量。

与袁老交谈得知，他来广州是要去出席一个学术会议，这会儿在等人。我试探性地提出与他合影，平易近人的老人爽快地答应了，并配合着与我们一行5人一一合照，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俨然自家人的一个长辈。

那时，袁隆平作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担任着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又是资深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名符其实的高级干部和名满天下的著名科学家，但他出现在宾馆大厅的时候，不仅身边没有簇拥的人群，连秘书和助手也没有跟随，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平凡得仿佛让人觉

得他是全中国最像农民的农民，甚至与豪华的大厅“不协调”。

我们向袁老表达着对他杂交水稻成就的赞誉，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老人听了，开心地微笑着。我感觉到那和蔼的笑容里不仅有成功的喜悦，分明还有些许羞涩。

袁老年轻时曾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得知我们来自江苏，去广东是为了学习运用价格杠杆促进环境保护的经验时，袁老说，南京有我的母校，我很关注江苏的环保工作。然后夸赞道：“你们的调研很有意义，加大价格改革力度，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体系，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推进环境保护的好办法。”

由于我们和袁老都要赶着去参加下午各自的活动，拍照之后，便匆匆分开